

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

查干敖包铭文考释*

——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078-09

●白玉冬 包文胜

〔摘要〕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的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是内蒙古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根据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地点及其印记,可推断该铭文应属于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纪年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极有可能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结合汉籍史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可推断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即为达茂旗一带的草原。而查干敖包铭文,则印证笔者有关“黑沙南庭”的这一推论不误。

〔关键词〕 查干敖包铭文;公山羊印记;黑沙南庭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自古活跃在亚欧大陆的突厥语族民族,开创了内陆欧亚游牧民族文字文明之先河。他们(包括突厥、回鹘、黠戛斯、葛逻禄等)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创造了一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最早的文字纪念物。①这种文字,因外形酷似古代北欧人使用的鲁尼(Runic)文字,故被称为突

* 拙文的投稿,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陈永志所长的首肯。在此,对陈所长允许我们考察铭文遗址并发表论文,深表感谢。

① 关于葛逻禄曾使用突厥鲁尼文字,见铃木宏杰. モンゴル国バヤンホンゴル・アイムグ発見のブンブグル碑文——八世紀中葉の北アジア情勢を伝える突厥碑文[J]. 村岗伦. 中世北東アジア考古遺跡データベースの作成を基盤とする考古学・歴史学の融合 2008.82-93.

厥鲁尼文。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除主要出土于我国敦煌莫高窟的一小部分写本外,绝大多数属于碑铭。这些碑铭,除分布在东欧、中亚七河流域和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部分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聚集地,其一为俄罗斯联邦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另一个是蒙古国。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碑铭,学术界称之为叶尼塞碑铭,被认为是古代黠戛斯汗国的遗物。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碑铭,包括鄂尔浑突厥碑铭、回鹘碑铭以及其他一些简短的碑铭。鄂尔浑突厥碑铭,属于后突厥汗国(682~745)时期,回鹘碑铭,则属漠北回鹘汗国(744~840)时期。

本文介绍的突厥鲁尼文铭文的发现地点,不属于上述地区,属于我国北疆内蒙古自治区,处于阴山之北的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以下简称为达茂旗)查干敖包苏木(现达尔罕苏木)境内。为便于研究,笔者按铭文发现时的行政区划,称该铭文为查干敖包铭文。查干敖包铭文发现于漠南地区的阴山北麓之草原,而7世纪末后突厥汗国的复兴地,则在阴山一带,故该铭文在突厥学界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下面,笔者略述拙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查干敖包铭文释读

有关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经过,笔者等已专文介绍^①,此不赘述。

该铭文位于达茂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东北45公里处的达尔罕苏木(乡)境内,西北距苏木政府约2.5公里,刻写于草原中一巨石之上。巨石矗立于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公里的草原浅谷北侧缓坡,整体呈青黑色四方体状,由南北两大并排而立的岩石构成。南侧岩石细高,上宽下窄,北侧岩石粗矮,由接近圆锥体状的上部和呈长方体状的下部组成。上圆下方的北侧岩石,形状近似粗壮的人体,上部圆锥体状部分,宛若人体头部。另东面地面紧靠巨石处,有一棱角已被磨掉、周长约300厘米的近似椭圆形的石板露出地表。

我们最为关心的鲁尼文铭文,顶端朝北横刻于巨石北侧岩石之下部长方体状部分的向东一面。铭文仅一行,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共11字。其中,第7至第10字的北侧,有一印记,面积约10厘米×15厘米。印记底部明显呈深黑色状,上部略显模糊,勉强见其轮廓(见文后素描图)。铭文右侧有宽约45至65厘米的空白处,其上方刻绘有三只公山羊岩画。根据测量,巨石、铭文相关数据如下:

巨石南侧岩石最高处距地表约190厘米,北侧岩石最高处距地表约155厘米。铭文所在北侧岩石的下部东面,上宽约50厘米,下宽约70厘米,左高约105厘米,右高约85厘米。铭文距左端3至5厘米,距上、下端分别为27厘米和18厘米。文字高约4至6厘米,字间距离约2至4厘米。

观察发现,巨石北侧岩石的圆锥体状部分似被人为放置于刻有铭文的长方体状部分的上部,且巨石东侧近似椭圆形的石板有明显的加工痕迹。这些迹象表明,充分利用了草原先天条件的查干敖包铭文及其附属物,应具备某种纪念意义。

查干敖包铭文照片,业已由孟克德力格尔先生发表在其编著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历史文化遗产》一书中。^②下面,笔者根据实地调查,作查干敖包铭文的拉丁字母换写(translit-

① 包文胜 哈斯巴特尔 白玉冬:内蒙古境内发现突厥卢尼文石碑[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5):152.

② 孟克德力格尔: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历史文化遗产[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41.

eration)、转写(transcription)、汉文翻译以及必要的注释。

换写 :ingisbničRWQ(鲁尼文读法自右向左)

转写 :qurčibänsigim

译文 骑士像我似的。

注释 1. qurčī 铭文第 1~5 字。名词 qur“腰带、皮带”后接表示从事某种职业的名词接尾字 čī“者”。在孟先生提供的照片上,第 3 字呈 𐰽(ng) 样。实地调查发现,第 3 字为 𐰽(R),开头 3 字为 𐰽>𐰽 𐰽 应读作 R W Q,可转写作 qur 或 qor。克劳森(G. Clauson)的《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源学辞典》收录有 qur 一词,解释为“腰带、皮带”。①qurčī原意可推定为“带腰带(皮带)者”。我们知道,腰带与游牧民的关系源远流长。战国时代著名的“胡服骑射”即模仿游牧民的装束,其中就包括穿裤子、系腰带。蒙古国境内发现的为数众多的突厥石人,多系有腰带,腰带上带有垂饰、袋囊、短剑或小刀等。②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列有包括突厥人在内的唐十四蕃君长石刻像。据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提供的十四蕃君长石刻像素描,标本 ZLJ F3 南②:1 左手抚腰带,右手举胸前,腰带悬挂有短剑、小刀和袋囊。③这一形象与蒙古国发现的乌兰伊热根呼特哈麻日突厥石人的 2 号石人像几近相同。④此北司马门遗址标本为突厥君长像无疑。这些代表突厥人形象的石人像表明,腰带为突厥游牧民战士的典型装束物之一。笔者认为,腰带上悬挂的袋囊象征骑射时盛装箭矢的箭袋。代表突厥游牧民战士形象的 qur“腰带”后接表示从事某种职业的名词接尾字 čī“者”而构成的 qurčī,解释作“骑士”当不误。⑤

2. bānsigim 铭文第 6~11 字。第一人称单数主格 bān 后接表示“像……似的”之意的名词接尾字 sig 以及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的领属附加字 im。按鲁尼文排列顺序,第 6、7 字应转写作 ānāb 或 nāb,但据笔者所知,在碑铭时代的古突厥语词汇中并不存在 ānāb 或 nāb。根据古突厥语语法规律,可以想到,该处需要一个与文末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的领属附加字 im 相呼应的词,即第一人称单数主格 bān。另外,笔者注意到,虽然鄂尔浑碑铭和回鹘碑铭几无误刻,但叶尼塞碑铭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非正常刻写,比如整行文字的上下顺序或词的前后顺序颠倒,甚至出现明显的错字、别字。⑥考虑到叶尼塞碑铭的这些特殊现象,查干敖包铭文上的 b 字与 n 字的前后顺序可视为颠倒了。据此,笔者将 bn 转写作 bān“我”,将 m g i s b n 字转写为 bānsigim“像我”。

① [英]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72. 642.

② 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28~41.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 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6(6):13.

④ 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34~35.

⑤ 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有赐予锦带作为身份象征的一部分的惯例,但查干敖包铭文内容否定了该处的 qur“腰带、皮带”为这种锦带的可能性。

⑥ [日]护雅夫.イェニセイ銘文に見える“säkiz adaqlıy barım”について[A].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二册[M].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443~444.




综上,查干敖包铭文可读作 *qurčibänsigim*“骑士像我似的”。值得注意的是,刻有铭文的北侧岩石整体形状近似一石人,似与铭文内容有关。

二、查干敖包铭文的断代问题

古代在欧亚大陆东部,有突厥鲁尼文碑铭的政治势力,主要有突厥、回鹘、黠戛斯、葛逻禄。不含任何与纪年相关之内容的查干敖包铭文应属于它们之中的哪一个呢?笔者拟从三方面入手,致力于提供尽可能正确的答案。

首先,就铭文的发现地——阴山北麓的漠南草原与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联系略作探讨。我们知道,东突厥汗国(583~630)时期,突厥曾在阴山一带设置牙帐,^①后突厥汗国的复兴地也在阴山一带。^②换言之,东突厥汗国时期和后突厥汗国初期,阴山一带曾是突厥的“京畿”地区。铭文正处于与突厥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阴山北麓草原。相反,在除突厥外的另三个曾使用突厥鲁尼文字的政治势力之中,回鹘汗国的统治始终是以漠北为中心,黠戛斯本土则位于蒙古高原西北的叶尼塞河上游,葛逻禄则主要在漠北以及阿尔泰山一带活动。铭文发现地达茂旗一带,大范围而言,处于草原丝路南端,自古为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处。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与中原王朝接触交流的回鹘、黠戛斯或葛逻禄有可能在此地留下他们的文化遗迹,但相对而言,曾长期占据这一地区的突厥人,则更有可能。

关于达茂旗一带的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文化遗迹,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盖山林先生曾有过翔实的调查报告。^③盖先生将达茂旗境内的岩画,与叶尼塞河流域古代丁零时代的岩画和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的岩画进行对比,指出达茂旗境内的岩画很大一部分应属于古代突厥语族民族的遗物。另外,盖先生还就达茂旗境内的古墓作了调查,认定许多是突厥古墓,部分古墓前立有突厥石人。笔者实地调查确认,其中的呼和哈达遗址有23座突厥方形古墓,位于查干敖包铭文西面约4.5公里处;查干敖包铭文南方约3公里处,也有2座突厥方形古墓。探讨查干敖包铭文所属年代时,这些突厥时代的历史文化遗迹,无疑应是我们需要重点参考的对象。古突厥人留下的这些生活痕迹,说明查干敖包铭文最大可能应为突厥人所留。

其次,毋庸置疑,刻写在铭文右侧的氏族印记,是断定该铭文所属年代的遗迹。如文后附图所示,印记左下方、下方、右下方外围呈“”状,上部呈动物图案。动物头朝左下方,长有长角,背部向右上方翘起,尾部伸向右上方,后腿与外围相连。笔者查阅北宋王溥撰《唐会要·诸蕃马印》以及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编《突厥语大词典》*Oγuz*条记录的马印,未能发现

① 张文生.东突厥建牙漠南小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69~71.

②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6~57;[日]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ついて[A].岩佐传一.岩佐精一郎遺稿[M].1936.79~91;[日]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A].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M].东京:汲古书院,1998.111~123.

③ 盖山林.内蒙古百灵庙一带突厥遗迹初探[A].张海斌.包头文物考古文集(上册)[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557~577.

类似者。①同时,在瓦西里耶夫收录的 145 块叶尼塞碑铭中,没有相同的印记,鄂尔浑突厥碑铭、回鹘碑铭、葛逻禄碑铭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印记。②然而如不考虑印记外围的 J,则发现上部的动物图案应为山羊形状。这与见于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和浩勒·阿斯嘎特(X0л Асгат)碑上的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公山羊印记几近相同。

众所周知,后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除著名的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噶欲谷碑之外,还有阙利噶碑和翁金碑等。其中,建于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前期的翁金碑,根据其内容,可知属于阿史那氏旁系家族。③翁金碑上所刻印记,与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上的公山羊图案非常相近,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翁金碑山羊的左侧多出一个接近垂直的 J 状线条。④看来, J 表示翁金碑的主人虽属于阿史那氏,但不是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的直系人物。参照翁金碑印记,查干敖包铭文印记外围的 J 状条纹,极可能表示该铭文的刻写者属于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翁金碑正面第五行谈到:

ba[sa] tabyačda yiriya atig oγuz ara yeti ärän yaγi bolmis. qaŋim[···]täŋrikän yän
anta yorimis, isig küčün bermis[ärti···]⑤

① 唐会要[Z]卷七十二“诸蕃马印”.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1305~1308.;何锐、丁一、校仲彝、刘静嘉.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62~64;R. Dankoff &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M]. by Mahmud al-Kašğari, vol.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82. 101~102.

② 叶尼塞碑铭印记见[苏]Д. Д. Васильев, Корпус тюркских рун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бассейна Енисея[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3.52; 突厥噶欲谷碑印记及汗族阿史那氏印记见塔拉、恩和图布信、陈永志、奥其尔.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67.187.189;回鹘印记见[芬]G. J. Ra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J].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30-3). 1913. 1~63, plate. N; 葛逻禄印记见铃木宏杰.モンゴル国ノバヤンホンゴル・アイムグ発見のブンブグル碑文[J].93.另日本学者大泽孝对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浩勒·阿斯嘎特(X0л Асгат)碑铭进行了重新解读,正确读出了š、N、š三字,指出碑铭(墓志铭)主人属于突厥可汗家族 ašinas(阿史那)氏。该碑铭也刻有公山羊印记。相关考证见[日]大泽孝.ホル・アスガト(X0л Асгат)碑铭再考[J].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5),2010. 32~33, 50~56.公山羊印记见第 13 页图 7 照片。

③ 碑文正面第 1、4 行。见[土耳其]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A].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255, 291;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86~187.关于翁金碑纪年,学术界分歧很大,尚无定说,为慎重起见,本文暂按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前期来处理。详细考证,拟另撰稿。

④ 翁金碑印记见[俄]W. Radloff, Mogolistan tarihi eserleri Atlas (Orhun: 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M]. Ankara:TIKA. 1995. 60. plate. 1. 但第 63 页拉德洛夫自插图版中,山羊胸部下方多出一 J 状线条,应为误描。

⑤ 转写及译文参考[土耳其]N. H.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J]. vol.1. Istanbul. 1936.128~129;[土耳其]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M]. 255~256, 291;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87~188.引文中存在代表前舌音与后舌音的字母相混的现象,有悖于古突厥语的元音和谐规律。为保持原貌,本文按碑文原字转写。其中,[] 内为推测复原。

另外,在唐朝的北面,在 atig 族与乌纥(九姓乌纥,即九姓铁勒)族之间,有七人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我父……投到了天汗(即后突厥汗国始祖骨咄禄)方面(并为他)贡献了力量。

atig 族尚未发现与其对应的汉文名称,其所在地不明。乌纥,即九姓乌纥或九姓铁勒,当时占据着漠北草原。根据引文内容,可知在唐朝北面,在与漠北草原的中间地带,主人之父曾与骨咄禄并肩作战。而查干敖包铭文所在地达茂旗一带,正属于这一地区。看来,翁金碑主人家族,在后突厥汗国复兴的 7 世纪末,曾在包括达茂旗在内的漠南草原生活过。固然,查干敖包铭文的 J 与翁金碑的 J,一个在山羊图案外围,一个位于山羊图案左侧,二者间略存差异,但二者形状接近,且翁金碑主人家族曾在包括达茂旗在内的漠南草原活动过。考虑到此点,我们推断,查干敖包铭文的主人,极可能与翁金碑主人一样,属于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

前文提到,东突厥汗国曾在阴山一带设置牙帐。那么是否可认为发现于与东突厥汗国有着历史渊源之地方的查干敖包铭文,应属于东突厥汗国时期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东突厥汗国时期的布谷特碑,是用粟特语、粟特文字刻写的。①林梅村先生推定大约建于公元 600~604 年间、属于西突厥汗国(583~659)时期、在新疆昭苏县特克斯河流域小洪那海发现的突厥石人上的碑铭,也是用粟特语、粟特文字刻写的。②史料明证,东、西突厥汗国是以粟特文字为官方文字。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突厥人在东、西突厥汗国时期已经使用鲁尼文字书写突厥语。鉴于此,笔者认为,查干敖包铭文的制作年代,当无属于东突厥汗国时期的可能性。

考虑到后突厥汗国在 7 世纪末以阴山一带为复兴之摇篮,至 8 世纪初期也曾控制阴山北麓,我们推断查干敖包铭文应为这一时期所刻。查干敖包铭文,其年代应早于鄂尔浑突厥文碑铭,极有可能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查干敖包铭文的这一年代,有助于我们确定在后突厥汗国对唐关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语焉不详的“黑沙南庭”之具体所在。

三、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

唐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汗国。之后,唐为突厥降户置云中、定襄二都督府,分突厥颉利可汗故地以隶之。关于这期间突厥人与唐朝间的关系,史料记载:“自永徽(650)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③

但好景不长,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发动叛乱。永隆元年(680),又发生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之乱。该乱平定后,永淳二年(682)即发生突厥复兴之祖骨咄

① S. G. Kljaštornyj & V. A. 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J].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6-1). 1972. 69~102; 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J].民族研究,1994,(21):64~71.

② [日]吉田丰,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新出ソグド語資料[J].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6). 1990.57~83; 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A]. 林梅村,松漠之间[C].北京:三联书店,2007.208~220.

③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66.

禄(682~691年在位)之乱。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东约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发现的后突厥汗国权臣噉欲谷为自己建造的突厥鲁尼文噉欲谷碑,翔实记录了后突厥汗国的复兴之路。碑文第一石西面在介绍完唐朝统治下的突厥人在骨咄禄带领下集结军队、发动起义后,第6~7行说:

6. anta kisrä täñri bilig bertük üçün özüüm ök qayan qışdım. bilgä toñuquq boyla baya tarqan

之后,由于上天赐予智慧,正是我推举了可汗。和谋臣噉欲谷·裴罗·莫贺·达干

7. birlä ilteris qayan bolayın biriya tavyaçıy öñrä qıtañıy yırıya oyuzıy üküş ök ö lürti. bilgäsi çavışı bän ök ärtim. çoyay quzın qara qumıy olurur ärtimiz.

一同当上颉跌利施(“聚国合民”之意)可汗吧!(为此)正是他(指骨咄禄可汗)在南方将唐人、在东方将契丹人、在北方将乌古斯人杀掉许多。其谋臣统帅正是我。

我们占据了总材山(çoyay quzi)和黑沙地方。①

碑文提到在噉欲谷推举骨咄禄为可汗后,突厥人占据了çoyay quzi和黑沙地方。《旧唐书》言:“骨咄禄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众为盗。”②《新唐书》则云:“(骨咄禄)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③可见,噉欲谷碑的çoyay quzi应与《旧唐书》、《新唐书》所言“总材山”一致,“黑沙”应相当于《新唐书》所记“黑沙城”。关于çoyay quzi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大体推定在今阴山及其以北地区。④至于“黑沙”,有些学者相信其位于呼和浩特北面,⑤也有学者认为在包头市白云鄂博西北方。⑥

《旧唐书》记载,武后圣历元年(698)后突厥汗国第二代可汗、骨咄禄之弟默啜(691~716年在位)请求和亲,武后派遣使者“大赍金帛,送赴虏庭。行至黑沙南庭……”⑦默啜的“黑沙南庭”应即《新唐书·突厥传》所言骨咄禄所据“黑沙城”与噉欲谷碑记录的“黑沙”为一地。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东受降城》记载“北至黑砂磧口七百里”。⑧东受

① 转写参见[土耳其]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M].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 249;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95.译文为笔者所加。

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67.

③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44.

④ 岩佐.突厥の復興について[M].107~119;[匈]K. Czeglédy, çoyay-quzi, Qara-Qum, Kök-öng[J].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5-1), 1962, pp. 58~60;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20;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870.

⑤ 岩佐.突厥の復興について[M].109~116; 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A].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册[M].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1957.245~246; K. Czeglédy, çoyay-quzi, Qara-Qum, Kök-öng[J]. pp. 58~60;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0;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298~299.

⑥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16.

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69.

⑧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

降城,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约 85 公里的托克托县城关镇东北。^①按与东受降城间距离而言,《元和郡县图志》所言“黑砂磧口”大体位于中蒙边境附近的戈壁入口。那“黑砂磧口”的“黑砂”是否可视作嗽欲谷碑的“黑沙”,即汉籍记载的突厥“黑沙城”或“黑沙南庭”的“黑沙”呢?

《册府元龟》载有永隆二年(681)镇压阿史那伏念、温傅二部叛乱的经过,提到:

曹怀舜为定襄道副总管,讨突厥史伏念。怀舜及裨将奚义昭、王孝诚等前军先往,为贼所绐。声言伏念、温傅等在黑沙北,各有二十骑以下,煮人肉而食之,可单马而擒也。怀舜等乃留老弱於瓠卢泊,晨炊蓐食,率轻锐倍道往袭之。既至黑沙,人马疲顿,竟不见贼。会延陀部落西行诣伏念,遇怀舜军乞降。怀舜等虽不获伏念而喜得延陀,遂按兵而旋。行至碧淥泊,军始为营。营内忽有泉水大如车轮,又遇大风飘折怀舜寝帐,众皆恶之。回至长城之北,与温傅相遇,列阵而战,交绥而退。^②

曹怀舜一行出击黑沙北突厥叛军,途中在黑沙截获了突厥延陀部落并回师,回程中宿营之后,在长城之北遭遇了温傅率领的叛军。可见,黑沙应在长城以北且距长城有一段距离。这里所言长城,姑且视作秦长城或汉长城。据《包头文物考古文集》介绍,阴山一带的秦长城横亘于呼和浩特市北郊、固阳县和乌拉特前旗境内,多半修筑在阴山山脉北坡,汉长城则修筑在阴山北的草原地带,分南北两线,南线位于达茂旗西南部和固阳县东北部,北线位于达茂旗中部。^③据此,可推断与长城有一定距离的黑沙,不应在阴山山麓附近。

笔者留意到《册府元龟》记载从黑沙回师的怀舜等在途中扎营“碧淥泊”,之后才在长城之北与温傅相遇。这说明黑沙应在长城以北的“碧淥泊”更北的地带。笔者在阴山北部调查发现,武川县和固阳县基本属于丘陵和草原的过渡地带,未有湖泊一类水源富足之地。北面的达茂旗,虽其东南部至四子王旗一带,基本属于荒漠草原,但其西南部至乌拉特中旗一带,尤其是在白云鄂博矿区西面的新宝力格苏木南部、艾不盖河河源一带,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美,该地至今还有地名大淖尔和小淖尔(“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据带领笔者一行进行田野考察的孟先生介绍,雨水多的年份,这一地区就会出现方圆达到 5 公里以上的湖泊。另外,达茂旗北部,还有两处湖泊,一为哈日淖尔,一为艾不盖河下游的腾格尔淖尔。上述几处湖泊,因近年环境恶化,干旱严重,已基本干涸,但千年以前的唐代,这些湖泊无疑都曾存在过。而在这些湖泊之中,最南面的大淖尔和小淖尔位于汉长城南线与秦长城之间,哈日淖尔和腾格尔淖尔位置靠北,在汉长城北线以北。根据这些湖泊与长城间的距离,笔者推断,上述湖泊之一可比定为《册府元龟》所言长城以北的“碧淥泊”,那“碧淥泊”以北的黑沙,应在今达茂旗北部中蒙边境一带。这样,《册府元龟》所言黑沙,也即嗽欲谷碑记录的黑沙,也应视为《元和郡县图志》记录的东受降城北 700 里的“黑砂磧口”之黑砂。位于哈日淖尔和腾格尔淖尔中间以北的满都拉口岸直通蒙古境内的戈壁滩,这条线路长期以来就是连接漠南和漠北的商路,其戈壁大漠南入口应为“黑砂磧口”。^④

“黑沙”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黑沙城”就应在戈壁沙漠入口附近呢?

① 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J].文物资料丛刊,1981,(4):216~217.

② 《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三《将帅部·败衄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5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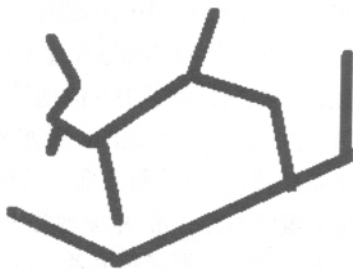
③ 张海斌.包头文物考古文集(下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1048~1050.

④ 出现于回鹘西乃乌苏碑(磨庭碾碑)北面第 8 行的“黑沙”,无疑也应为该地。

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他们需要丰美的草场来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显然,作为戈壁沙漠入口的黑沙并不符合这一客观要求,更不能充当突厥汗国复兴之根据地这一角色。笔者认为,史料记载的“黑沙城”、“黑沙南庭”,实指突厥人占据、靠近黑沙的草原地带,也即达茂旗一带的草原。

唐时曾任河东节度使都虞侯的李筌于乾元二年(759)完成并献给朝廷的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河东道言:“道历三川口,入三山母谷,道通室韦大落泊,东入奚,西入默啜故地。”^①这里所言室韦“大落泊”必是《新唐书·奚传》所记奚西面的“大洛泊”,即今内蒙古科克什克腾旗西北的达来诺尔湖。而中唐以前的奚居地,一般认为应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看来,可推定为位于奚居地之西、李筌笔下的“默啜故地”,即后突厥汗国之故地,应在阴山及其以北地区。笔者在前面介绍的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地——达茂旗正位于阴山北麓。

查干敖包铭文虽未直接记录突厥之复兴,但根据铭文发现地点、铭文右上方的山羊岩画以及铭文特点,可推定该铭文之年代应为后突厥汗国初期的7世纪末至8世纪初。这一年代,从侧面反映达茂旗一带之草原正是李筌笔下的“默啜故地”,是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黑沙城”,是后突厥汗国复兴之摇篮。



查干敖包铭文印记素描图

谢辞 拙文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宝音德力根教授组织的内蒙古大学科研成果。宝音德力根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专项资金支持。达茂旗原旗长、哈布图哈萨尔祭祀传承人孟克德力格尔先生提供了有关碑铭的信息并帮助寻找碑铭,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博士生哈斯巴特尔则为寻找铭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上述人员,一并表示感谢。(本文英文摘要见 P.99)

[收稿日期]2011-03-26

[作者简介]白玉冬(1969~),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教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文学博士。呼和浩特 010021
包文胜,历史学博士。呼和浩特 010021

① 丛书集成新编三十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251~252.另李筌生平,见赵国华.李筌与太白阴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23.327.

②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73.

王 具体指这些人物在宗教、交换和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些人物因与广义的“物”的天地、事物的过程密切相关,所以成为人们眼中的人物。

张 这是否意味着,您研究西南,无论是讨论“中间圈”,还是讨论“超社会体系”或者说文明,都应同时考虑它们的地区特殊性和普遍理论意义?

王 所有社会都生活在中间状态,没有一个社会不依赖其他社会生存,没有一个社会自身构成一个完美的体系。一个社会要构成一个有序的体系,总是需要借助周边社会的因素,甚至将自身归属于另一个体系。这是普遍的。我选择在西南论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地区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社会逻辑。我相信,诸如“走廊”、“中间圈”、“超社会体系”这样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在行走西南的过程中,我时常想到东南,看到二者之间贯通的必要性,我也多次走访西北地区。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可以乐见关于河西走廊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也可以乐见西藏、西南、东南亚多重时空体系的研究。它们都将为我们展示出文明互动的历史画卷,这些画卷描绘的事物与进程,都将是“地方性的”,但同时也将具有理论的含义。

[收稿日期]2011-12-07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1
张 帆(1983~)女,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About Čayan Obuɣa Inscription in Turkic Runic Script Found at Bao Tou City of Inner Mongolia—Also on 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 Imperial Court of Black Sand(黑沙) of Second Turkic Khanate *Bai Yudong Bao Wensheng*

Abstract: Čayan Obuɣa inscription written in Turkic Runic script that was found in Darhan Moomingyan Holburɣatu Hošiyu(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of BaoTou(包头) c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a piece of uncommon Turkic culture remains in China, and is the only documentation in Runic Script found in Inner Mongolia so far.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Čayan Obuɣa inscription and its clan seal (Tamuga),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inscription should belong to the collateral family of Second Turkic Khanate Khan's family Ašīna (阿史那). This inscription should have been produc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7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8th century and is also the earliest Turkic Runic historical document found so far. Based on some related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the authors' fieldwork,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outh imperial court of Second Turkic Khanate that is called Black Sand (黑沙) was in Darhan Moomingyan Holburɣatu Hošiyu. Čayan Obuɣa inscription proved that our inference about the south imperial court of Black Sand should be correct.

Key words: Turkic Runic script; Čayan Obuɣa inscription; the clan seal of the hegoat; the south imperial court of Black Sand (See P.78)